

# 黄崖之谜：晚清时期一场有争议的“叛乱”\*

裴宜理(E. J. Perry)<sup>1</sup> 汤姆·张(Tom Chang)<sup>2</sup> 著

刘晨<sup>3</sup>译 刘平<sup>4</sup>校

(1. 哈佛大学 2. 亚利桑那大学 3.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4.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摘要：**同治年间，数千民众听从学者张积中的召唤，聚集在山东肥城、长清交界的黄崖山，原本是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寻求互助共济与自卫，但最终被山东地方政府认定为“邪教”，加以残酷扫荡。促使黄崖教案发生的潜在罪证是这场运动的社会结构。看起来像是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的黄崖事件（黄崖教案），揭示了晚清乡村社会与宗教、士绅、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各种阶层和各种利益的联合，也是政府用高压手段处理民间组织的一个典型案例。其负面影响巨大，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急剧增加了中国乡村精英阶层对政府权威的疏远，并使地方保护主义和土匪结合起来，形成武装反抗。半个世纪后，不成熟的民国政府和晚清统治者相比，也不能更好地对乡村地区施加控制，宗教启示性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遍布华北，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另一道风景。

**关键词：**黄崖事件 张积中 阎敬铭 太谷学派

1866年秋，一场被清廷定性为宗教叛乱的事件，发生于山东中部偏远的黄崖山之巅。根据官方奏报，政府对这场所谓起义的镇压，造成超过万余抵抗的叛乱者死亡。是什么原因能够鼓动人心，让这些抵抗者组织起来的呢？这一事件是闻名于世的中国异端性宗教叛乱史册中的又一条目吗？

这一事件发生的有关起因很难收集，事件虽然平息，但这一事件本身却在政府官员、山东民众和

相关学者中引起一场激烈争论。围绕黄崖事件之谜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晚清乡村社会原貌，并对政府在乡村渗透的性质和成效、地方精英的忠诚、士绅和民众的关系、当时的主流信仰体系进行评价。这项试图再现黄崖谜剧的初步研究，也将涉及这些较为重要的问题<sup>[1]</sup>。

## 演员：张积中及其朋友、先师

据称这场灾难背后的主谋是一位名叫张积中的老人。大约在黄崖事件之前六十年，积中出生于一个绵延数代的士宦家庭，排行第七。在其生前，积中的堂弟张积馨官至护理陕西巡抚。积中自己的长兄张积功于1854年殉难，生前曾经取得令人羡慕的举人功名，并做过四任州县官近二十年。积功之殉难，系在担任临清知州时，太平军突进临清，积功及其直系亲属全部遇难。因积功独子亦死于此战，他的侄子、积中之子绍陵袭荫。此后不久，绍陵也获得一个官职。在黄崖溃败的时候，绍陵已经做到山东候补知县<sup>[2]</sup>。

他们的亲属、被定性为宗教叛乱者并最终葬身黄崖山火海的张积中，有关他的记载不甚明晰。据说，积中尽管幼时饱读诗书，但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售<sup>[3]</sup>。然而，在某些资料中，积中被描述为一个

\* 本文中译文系“近代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国际学术研讨会（济南，2011年10月）的参会论文，英文原名 *The Mystery of Yellow Cliff: A Controversial “Rebellion” in the Late Qing (Modern China, Vol. 6, No. 2 (Apr., 1980), pp. 123-160.)* 作者简介：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汤姆·张(Tom Chang)，亚利桑那大学东方研究系。译者简介：刘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校者简介：刘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经担任过教官的贡生<sup>[4]</sup>。我们能够知道的是，积中是前任湖广总督周天爵的幕僚。经周天爵举荐，积中在1851年或1852年受命为两江总督担任幕僚，两江总督管辖江西、江苏、安徽地区，在阻挡太平军进军中至为关键<sup>[5]</sup>。积中以这种身份和其他积极参与镇压起义的南方杰出士绅建立起密切关系<sup>[6]</sup>。他在发展地方团练方面的努力受到重视，并曾到北京接受朝廷召见<sup>[7]</sup>。

即使张积中对自己相对普通的身份感到些许不满——与他所接触的那些地位不俗者相比而言，他仍然不是那个因为科举失败、丧失晋升希望的洪秀全。当时，张积中的世界是充满权力和影响力的世界：士绅、地方官、督抚。但是，他与广东那位遭受科举挫折的叛乱领袖至少有一个共同点：转向一种极不寻常的哲学宗教信仰。

张积中青年时代生活的扬州，在19世纪初是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在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个叫周星垣的术士，他擅长于吐纳、辟谷、符篆等传统神秘之术。张积中显然很是痴迷于这些神奇的力量，于是拜周为师。在积中的帮助下，周星垣在扬州士绅中吸收了大批虔诚的追随者<sup>[8]</sup>。

事实上，这些受过教育的上层人士对周星垣说教的兴趣，与刚开始时的那样出人意料已经大不相同。因为后来的官方记载迫切强调张与乃师学说的“异端性”<sup>[9]</sup>，尽管如此，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仍然有不少有价值的内容。

实际上，周星垣的教义可以追溯到明代哲学家王艮（1484—1541）和林兆恩（1517—1598）的著作中。这两类看似明显无关的思想家的理论，在明末和清代的知识界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分支。为评价周星垣及其弟子张积中的思想，我们先离开主题去分析一下他们从前的先师。

王艮，生长于扬州属下的泰州，系盐民家庭出身。为了长大能够经营家庭生意，王艮从小就接受商业训练。还在少年时，王艮为陪同父亲北上山东卖盐而终止了正规学习。二十一岁时，在扬州繁华的贸易中心，他已成为一名独立盐商。除商业活动

外，这位年轻人对中医和古典哲学也很感兴趣。据说，在二十八岁的某一天，他忽然梦见自己只手托起即将坍塌的天，并使太阳、月亮、星星重新恢复运转<sup>[10]</sup>。这一幻象使王艮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自己就是一个活动中心。随后，他开始阐述自我（身）为本、社会为支的观点，个人幸福被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他以古代圣贤、帝王和孔子的名义传播其思想，按照古礼穿上长衫，戴上礼帽，开始接受有悟性的弟子。1521年，王艮宣称自己是儒家传统的另一位重要改革家王阳明的弟子。他跟随老师治学，直到王阳明在1529年去世。之后王艮回到泰州家乡，开办起自己的学校<sup>[11]</sup>。

在学校里，王艮演讲内在知识（良知）的概念，他解释为首先要求爱自己，然后爱他人。恰当的自我修养自然会引导一个有序的社会。自我是一切事物的中心，是至高至善，是道。为了推广这些被认为是儒家核心理论，王艮依靠大量的佛教和道教语言。研究被看做是一种自发的和快乐的心灵觉醒——对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开放的追求。无论这一理论是由何种语言构建起来的，都是行之有效的。王艮的很多学生来自社会贫困阶层，农民、樵夫、工匠、陶工和厨师，自然也有士绅中人。

尽管王艮没有提出先进的社会政治理论，但他对社会公正做出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他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他从富户那里募集粮食，赈济饥民；疾疫流行时，他向病人配发药物。1538年，他为当地贫苦盐农请命，并成功获得较为公正的土地分配<sup>[12]</sup>。

作为后人所知的泰州学派，王艮留下的是通往儒家理想的个人主义路径，强调个人理解，道教和佛教的见解作为适当的补充；王艮强调自我意识与对被压制的幸福的关注，培养社会道德的浓厚气息。

福建的林兆恩与王艮属于同一时代，但显然是相当独立的，是另一种有杂糅倾向的哲学家。与王艮不同，林兆恩出生于明代一个有多人获得功名和官位的显赫家族。然而，像王艮一样，林兆恩也经历过一个印象深刻的梦境。在他的梦幻中，林与高贵的孔子、老子、佛陀相会，每一位伟大的先贤都

向他揭示了其各自教义的精华:道、玄、空。林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身穿奇特的服饰,穿越东南,教化世人。他的讲学结合治病指导,在福建、江西、浙江赢得了成千上万的信奉者<sup>[13]</sup>。

林的治病术叫做“良背法”,包括建议病人集中注意力到自己的身后。这一建议可以广泛而有效地治疗各种疾病,患有眼病、精神紊乱还有其他疾病的高官也纷纷笃信采用。林也施术作法,以祛除鬼怪,平息风暴。尽管有人传言其为异端邪教,但林兆恩无可挑剔的家庭背景、拥有较多上层社会的支持者和作为慈善家的口碑,都有效阻止了政府的严重迫害<sup>[14]</sup>。

林兆恩死后,各地开始兴建名为“三教堂”的寺庙,以纪念他的诸教合一之说。这类“三教堂”机构同样吸引了大批来自民间和官方的信奉者<sup>[15]</sup>。1774年,林兆恩死后近两个世纪,这些祭祀场所的不断发展,促使乾隆皇帝颁发禁令,禁止继续建立三教堂<sup>[16]</sup>。

部分原因是由于清廷不能容忍任何对新儒家正统构成挑战的活跃事物的存在,从王艮、林兆恩到晚清的追随者,这些精确的发展线索已经不是十分清楚。可以肯定的是,王、林以及后来他们众多的信徒都坚持认为,他们信奉的是儒家正统学说。然而,杂糅佛、道,对治病术的兴趣,成员中混杂着官员与胸无点墨之辈,这些都使笃信诸教合一说的追随者们被置于异端嫌疑之中<sup>[17]</sup>。

这就是那位扬州术士声称的知识继承的根源。周星垣自己的教义(或称作泰州学派,或是太谷学派,或是大成教),以类似于王阳明的方法强调“良知”和“实行”的重要性。周星垣幼时失去父亲,稍长即四处游学,接受教育。他先在福建学习道教,后又在安徽学习佛教,他曾独自一人登山接受启示。据说他在那里发现了儒家(大成)成功的关键,即心息相符<sup>[18]</sup>。这一启示鼓舞周广泛宣传自己的发现,从而吸收了众多的信奉者,包括他自己先前学习佛、道时的老师。他的哲学见解,通过增加神奇的医术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环节,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在

其晚年,周将其广为流行的学说带到扬州,在那里,这位目不识丁的传教者的语录被他的学生记录下来,并汇编为哲学文集<sup>[19]</sup>。

尽管周星垣的弟子中包括许多高官,但他那不同寻常的教义最终还是导致两江总督下令将其监禁。监禁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大损害,出狱不久,周星垣就去世了<sup>[20]</sup>。

除了张积中,周星垣还有其他数以千计的忠实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来自扬州的李光圻<sup>[21]</sup>。李光圻二十岁的时候,沉痾在身的老师周星垣把他叫到病床前,嘱咐他继续传道<sup>[22]</sup>。周死后,李光圻游历全国,到处传播乃师的信条。尽管是以西湖地区为中心,李仍然通过在各地讲学,成功地在许多地方培养了不少优秀信徒。在他的激励下,一位担任山东知县十年的进士放弃仕途,投身传道事业。一位同样拥有进士功名的甘肃藩司成为李的另一位忠实信徒<sup>[23]</sup>。

当李光圻四处游历传道的时候,张积中则采取了一种较为固定的方法<sup>[24]</sup>。积中在老师去世后,便沉浸在写作之中。除了对周星垣的教义进行评论,积中还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著作加以批判,把道家 and 佛教的观点应用于解释儒家经典。虽然积中并未公开传教,但想要执弟子礼者纷至沓来。显然,张积中之所以如此广受欢迎,在于他那令人振奋的说法。他宣称,他老师的遗体已像道家仙人一般消散,为那些想要成仙得道之人树立了榜样<sup>[25]</sup>。尽管这一断言属于非传统论调,当受到挑战时,积中也能在士绅中间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传统学者<sup>[26]</sup>。

但是,没过多久,平静的学术生活在混乱的扬州变得难以为继。早在两年前就杀死其兄一家的太平军,如今又威胁到这座城市的安全,1856年,积中被迫逃离扬州。由于他的儿子在山东做候补知县,他的表弟吴载勋<sup>[27]</sup>也在山东做官,张决定全家北迁山东,以逃避叛军的威胁<sup>[28]</sup>。

到达山东后,张定居于肥城和长清交界地区,显然这是一处远离叛军攻击的安全的山区,并且幸

运的是，这里还有他另外一家亲戚。尽管这里是一处僻静之地，这位扬州学者的到来不久就受到当地士绅的关注。肥城的一位生员刘曜东尤其仰慕张积中的学识。为了表达自己成为张积中弟子的意愿，刘分出房屋安置积中一家。积中接受了他的热情款待，并搬进刘宅居住，据称刘家已经定居黄崖山顶有数代之久<sup>[29]</sup>。然而，或因由于这里山区条件的欠缺和封闭的缘故，张不久又接受了另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安置邀请，迁居至东北方向大约五十英里的博山。博山以其壮丽的景色闻名，积中在舒适的环境中居住了数年。然而，1861年冬，捻军逼近博山，又促使他回到黄崖<sup>[30]</sup>。尽管黄崖不能提供许多便利的生活条件，但是由于它位置僻静，似乎可以免受叛军攻击的影响<sup>[31]</sup>。

#### 布景：黄崖山灭顶之灾的前夜

黄崖位于肥城县城西北约20英里处，三面环山，中间是一片大约15英亩的隐蔽区域。隐蔽区大约有一英里高度，只能通过曲折的路径到达，为躲避叛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sup>[32]</sup>。

由于捻军在山东南部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难民为黄崖山隐蔽的位置和张积中的教义所吸引，纷纷前往。积中表弟吴载勋此时刚被提拔为山东省会济南的知府，由于他的大力支持，积中也开始在官场上得到一批忠实的拥护者<sup>[33]</sup>。

1862—1863年，由于捻军在山东的活动日益频繁，张积中开始在黄崖督众垒石为寨，为其日益扩大的村落提供更多的保护。他在山下开挖壕沟，设武备房，制造和存放武器。张回到黄崖六个月后，山寨经受住了它的第一次考验。当土匪进攻周边地区时，黄崖民众加固据点，又为难民准备米粥和汤水，使其安全躲避战乱。当然，张积中防御措施的成功，大大增加了黄崖在当地民众中的吸引力。不久，大约有八千户居民——其中有数百士绅和宦宦——迁居到安全的黄崖山及其周边村落。可以推测，新来的成员中有不少是地方富户。他们携带着大量财富，意外地给曾经荒凉的黄崖山带来了富裕

之名<sup>[34]</sup>。

可惜我们几乎没有张积中那些富裕信众的资料。我们知道，起初大力支持张积中迁居黄崖的生员刘曜东，作为积中最为信赖的助手之一，在扩张村落的过程中继续发挥着积极作用<sup>[35]</sup>。积中最喜爱的弟子是其表弟吴载勋，吴在1862年因处理当地起义时的表现而被撤职<sup>[36]</sup>，之后他迁往黄崖。张积中还收了两个女弟子，其中一个张积中在扬州时的老师周星垣的孙媳，早年守寡；另一个是积中的侄女。这两位女子都住在专门的房间里，任何拜访她们的人都要行九叩首之礼，拜见张积中时也要行同样的礼节。张依靠当地士绅家庭出身、排行第五和第六的朱氏兄弟负责防卫之事。由于朱氏兄弟的一位兄长是附近水里铺的团长、文生朱良峯，兄弟俩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军事援助，以保护黄崖居民<sup>[37]</sup>。

然而，许多资料记载，黄崖似乎也依靠一些名声不佳的人员负责防务。为了确保众多富户的安全，很多人被雇佣为守卫。这些被雇佣的守卫，主要来自山东社会中的“流民”，显然也包括这一阶层中的大批盐枭。张积中欢迎这类新成员入教，强调即使低贱之人也可以成为他的重要弟子。为了保持泰州传统，他声称其法平等，弟子无强弱贵贱之分<sup>[38]</sup>。然而事实证明，由于与山东下层社会中人发生联系，黄崖社区付出了昂贵代价。

言归正传。在1866年血腥大屠杀发生前，还有几年的时间。其间，在张积中的领导下，聚集在黄崖的那些成千上万的难民是如何生活的呢？教育制度显然是非常严格的。新成员要住在校舍里，必须通过一种有关忠诚信仰方面的强化教学项目。尽管积中本人很少参与教学过程，但是他指派其信赖的弟子负责灌输其教义。在训练阶段后期，信徒们要求能够背诵张的许多语录。一旦入教，信徒们要露出右肩作为标志，没有允许不得下山。在他们的新生活中，严禁物欲和性欲<sup>[39]</sup>。

为了提供持续的精神感召，积中时常在山顶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夜祭，该大厅叫做“圣人堂”。举行仪式时，积中的两个女弟子盛装挟剑而侍。仪

式中要焚烧大量熏香和檀香,光照数里。积中本人身着古代衣冠,喃喃自语。虽然表面上是举行祭孔仪式<sup>[40]</sup>,但奢华的祭祀形式在周围乡村引起不少谣言。由于只有真正虔诚的信徒才被允许参加,这一仪式被乡民称作“张圣人夜祭”<sup>[41]</sup>。

祭祀事务仅限于重要信徒,而公开演讲则吸引了更多的人。张每个月都要出席由整个肥城和济南地区的学者参加的哲理讲座。他的演讲旨在阐明泰州学派传统的诸教合一思想,指出儒家和佛教理论的衔接,批评过于狭隘的思想路径<sup>[42]</sup>。尽管张在其主张中坚定声明以儒家为基础,仍然有不少人对他产生怀疑。是否由于他的演讲不甚明晰,或是部分听众的误解、歪曲,抑或由于缺少真正新奇的内容,这一系列讲座引起了张实际上是在传布邪教的谣言<sup>[43]</sup>。

尽管有很多外人可能会怀疑黄崖的未来,张积中成千上万的信奉者却从不缺乏信心。正是这些信徒在精神和物质上的信任,使黄崖有了发展为繁荣的宗教和商业中心的可能。新成员被要求捐献出其财富的一半,张积中则把这些钱财用于山寨建设<sup>[44]</sup>。纷至沓来的忠实拥护者及其捐赠促成了这一地区大批商铺的建立,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这一切都在积中的掌握之中。商业盈利被用来支付黄崖山寨的花销。黄崖山还在黄河沿岸的重要地方开设盐铺,将其商业网络延伸到大约三百英里外的地区<sup>[45]</sup>。因为盐业为政府垄断,私自售盐被严令禁止,我们推测,黄崖的盐业可能是在信徒中的盐贩帮助下进入市场的。不管他们存在什么非法关系,这些商铺显然是有利可图的。

黄崖山寨的经济支撑还来自位于山麓的三个农业村庄。以南黄崖、中黄崖和北黄崖命名的三个村庄盘绕在山脚。显然,大部分农民宣布效忠张积中,尽管其中许多人没有能够掌握入教所要求的那些东西。这些人可以自由回家,我们推测,他们农业劳作的收成对维系黄崖山寨的信仰是很重要的<sup>[46]</sup>。

在张积中的指导下,还成立了两处医药局,一个在黄崖,另一个在附近的水里铺。张积中的先人

曾经依靠这些传统医术获得声名,这两处医药局也受到周边乡民的欢迎<sup>[47]</sup>。

还不清楚这些相当数量、从事各种活动的黄崖人口,是靠什么政治结构进行管理的。在教主和老师张积中的名义掌控下,山寨表面上按照某种神权政治的模式进行运作。虽然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体系存在缺陷,至少还有一些制度化的尝试。在山巅和山脚都设有公局登记人口,处理内务<sup>[48]</sup>。我们认为,他们的防务主要依靠团练和雇佣兵的联合。

因此黄崖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会团体,设置了一整套特殊的教育、宗教、经济、医疗、政治和军事机制<sup>[49]</sup>。但是,如果黄崖脱离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它也是一个反政府的武装团体吗?不久我们将听到政府对这一山区避难所的指控,但在听取这一控案之前,让我们先阅读一下那份最有价值的资料:在所谓叛乱前仅十天,一位游览黄崖者写下的游记<sup>[50]</sup>。

游客名叫汪宝树,进士出身,曾任知县,其家位于黄崖东南三十英里处的泰安。在两位宁阳士绅朋友的劝说下,汪宝树决定前往黄崖,他的朋友告知,黄崖发生了诸多稀奇之事。为了满足对黄崖的好奇心并沿途游览风景,三人带了两个仆人往西行进。几天后,访客们到达黄崖。山脚下的村落看起来比较冷清,他们在公局登记,是夜寄宿于公局。那天晚上,黄崖山寨的几名成员热情地款待了他们,成员中有来自浙江的望族虞逊和朱氏兄弟。他们谈论的主要是诗文,黄崖居民还多次提到外人怀疑山寨流行邪术是误传。

第二天,汪宝树及其同伴游览了山脚的村庄,对正在快乐地从事农作的乡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部分凿洞而居。游客也对张积中进行了短暂的礼节性拜访,及时了解到他那优良的家族声望和其他居民给予他的尊重。当晚,他们寄宿于黄崖原始居民、张积中的忠实弟子刘曜东的家中。他们的谈话涉及广泛:雨水多寡、朝鲜抗击洋人、捻军动向和黄崖防御的可靠性。显然,当地居民非常担心叛军的威胁,刘曜东建议游客要与他们保持联系,互

通有关叛军动向的信息。

游客们在刘的陪同下度过了一个最为愉快的夜晚。次日，游客们在虞逊和朱家兄弟的陪同下游览山寨。离开山脚的村落，他们沿着狭窄的山径，穿越了大约一英里长的崎岖之地，到达山寨的头门。头门由方石砌成，以铁门加固。沿着山梁又走了大约五百码，他们来到二门。门前空地上散布着许多破甕。汪询问居民这些破甕的用处，他被告知，这些甕最初由来到这儿的避难者安置（危机发生时作为储物箱），但后来被山上的牧人掷石破坏了，显然他们不知防卫的重要性。

二门内有抬炮数门，锈蚀到几不可用。汪问道：“胡不置诸门洞？若风雨剥蚀，一旦有警，岂不误事！”虞谴责守门人的疏忽，并责令其将炮移至门内。看到山中许多围墙坍塌，汪询问为什么不去修复。主人回答道：“公事难办，村人徂目前之安，农忙不欲兴工，所幸此地幽僻，贼惮险阻，略有规模，可恃不恐。”山寨极为寥廓，汪顺着他的问题继续问道：“何以守？”虞笑着回答：“本村人数不敷其半，全赖朱兄八百精锐，若朱兄不来，失所恃矣！”

在山巅，游客们来到另一处公局，这是一处长满荒草的三楹结构。旁边有十几间小屋，算是办公的地方。这些房屋之间连接着以南方建筑风格修建的回廊，反映出大多数山寨领导者的情趣，他们都是从数百英里外的南方迁居而来的。有两楹支撑的屋子是张积中的住所，因天气原因而损坏，正在修复。张积中住所的南边是其表弟吴载勋的居处，简陋，无人居住，石质结构，茅草屋顶。黄崖其他居民的房屋也是石头砌成，方广数尺。除去地面上的杂草，房间空无一物。艾蒿遍布山地，空无一人。

山寨东面是一处险要之地，以方石为墙，高约一英尺，周边环绕着坚固的栅栏。墙上题名曰“咏归台”。通往山寨有一扇小侧门，是为东面山区的乡民准备的。走出侧门，再攀登数百码，游客们看到有红色围栏，蜿蜒直上山腰。旁边有一指路石碑，刻有“采药径”三字，想必是为黄崖医药局采集药物之地。路旁有一座六角亭，路的尽头是一处修缮

不错的小屋，一名男子正在读书。朱氏兄弟解释说，这些制作都是用盖屋时的剩余材料建成的。围栏是为了防止老弱跌倒，涂以红色是为了引人注目。墙是用来防御的，但也可以让人们眺望。凉亭与房屋是为避难者提供休息的地方，也可以防贼追击。自山下看，就如同福建武夷山的幔亭<sup>[51]</sup>。

山寨之旅结束后，游客们回到山下公局度过最后一夜，回家后不过数日，汪惊闻黄崖被屠之事。

虽然汪的游记没有记载我们想要探讨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张积中的性格、政治权威的性质、居民的社会构成——但是记载的确大大有助于消除任何黄崖是一个徘徊于叛乱边缘的集团的解释。从汪的记述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定居群落的图像，该群落以辛勤劳作的农民为基础、由担心其社区安全的都市文人所领导，但紧接着，这一切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那么对抗为什么发生？是什么让官军登上险峻的山腰，摧毁黄崖山寨，屠杀数以千计原本无辜的居民？

#### 剧情复杂化：官府对黄崖的怀疑

1865年深秋，黄崖发生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首先引起了省府的关注。当时一个名叫王小花的男子被潍县官府逮捕。王收拾行装，准备携全家迁往大约一百三十英里外的黄崖。潍县知县发现此事相当异常，便逮捕了王。经审讯，王供称曾有人召其赴黄崖，拜张积中为师，计划加入聚集于黄崖山的信徒群体。

知县向省府报告此事，要求全面调查。对此，山东巡抚阎敬铭派出两名使者前往黄崖调查。两人见到张积中，深感积中言辞儒雅，有长者之风。他们特别注意到张积中一家世代忠良，积中至亲又多有功名和官职。张积中的教义看起来并无危害，其信徒也都安于农耕治学。此外，两位使者确信张未曾听说过远方潍县的王小花。总之，没有理由追究此事。至此，阎抚也乐于息事宁人<sup>[52]</sup>。

然而，次年，另一件事又使黄崖引起了巡抚的

注意。1866年10月,捻军严重威胁到山东,在距离黄崖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益都县发生一起叛乱阴谋。经审讯,被捕的策划起义的首领冀宗华供称尚有同伙五人在逃,均系黄崖张积中弟子<sup>[53]</sup>。他还交代,张令其聚集人马,准备深秋起事,先取益都县城和济南,然后控制全省。经巡查,益都县报称捕获叛匪十一人,供称系黄崖信徒,同时供出占领益都和济南的计划。这些谋划起事的叛匪除一人外全部处死,幸存者被监禁,留待与张积中对质<sup>[54]</sup>。

与此同时,还有几件关于黄崖的令人不安的报告送达省府。将军耆善一日路经黄崖,曾停留酒店进餐,饭毕,店家告知饭钱已由张积中付清,张还邀请他上山休息。将军非常怀疑,拒绝了邀请,并将此事告知阎抚<sup>[55]</sup>。另一件报道是,一位山东候補道在济南完婚,新婚三天后,新郎告诉妻子自己即将远赴黄崖听张积中讲学,妻子非常烦恼,力劝丈夫出行,但丈夫仍然坚持说张积中约束甚严,不得不前往。妻子把这件奇怪之事告知父母,父母担心其新女婿系邪教中人。由于担心全家遭受牵连,其父——也是一位道台——遂将此事报告阎抚<sup>[56]</sup>。

阎抚获悉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后,又一次派人前往黄崖调查,这次的调查者包括肥城和长清两县的知县,还有一位来自省府的守备。使者令张积中来省自白,并告知因其年迈,且系累世大家,政府无意杀之。这些使节及一大批随员到达黄崖时,遇到了张的表弟吴载勋。这位前济南知府正匆忙移家下山。吴告诉来访的官员,他表兄外出游五峰山未归。言谈间,忽然有人从黄崖山持书疾行授吴,吴色变,催促官员们离开<sup>[57]</sup>。守备察觉事情不对,上马冲出,但有一侍从被山上下来的人杀死。肥城知县进入山寨,听闻炮声,立即驰回,一侍从也被杀死<sup>[58]</sup>。

一则资料告诉我们,黄崖居民也许是因为将官员及其随从误认为贼匪,才开枪自卫<sup>[59]</sup>。另一则资料表明,守备禀报巡抚时或许夸大其词,以掩盖其过失。但我们都不能确证这些事情<sup>[60]</sup>。我们可以确

信的是,巡抚认为黄崖正在酝酿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为了防止叛乱的发生,阎召来张积中的儿子、山东候補知县张绍陵,令其前赴黄崖劝父来省自白,限期五日,否则便要大举进剿。

尽管绍陵尽力劝说父亲,张积中仍然不为所动。据传,他对儿子解释道:“吾讲学有何罪?若辈乃欲媒孽我耶!贪黷官吏,欲借此以兴大狱,为立功地。我若往,彼辈锻炼周内,何求不得,即幸而事得解,乃公肯以磊磊落落之身,低首下心以乞活耶?汝辈惧,可自往也。”妻、子含泪苦求也没有动摇张老先生留在山寨的决定。积中坚持道:“积中此生,决不履公庭,必欲积中出者,积中出就死耳!积中亦丈夫也,伏剑而死则可,桎梏而死则不可,积中以身殉学矣,何出为!”看到父亲不为所动,孝顺的儿子绍陵也选择留在黄崖<sup>[61]</sup>。

阎抚没有从绍陵那里得到回复,转而求助于张积中的另一个亲戚、表弟吴载勋。现在该由吴尝试劝积中从其藏匿处下山了,但当吴到达黄崖山脚时,却被拒之门外<sup>[62]</sup>。

当这些秘密劝说张积中投诚的尝试陷于不果的时候,其他更为公开的事情却在大大张旗鼓地进行。在黄崖山民为难政府使者的第二天,据记载,所有山区居民都开始迁往山寨。黄崖山巅立有大红旗,寨墙遍插旗帜。运送柴草、粮食、煤炭和蜡烛的人车络绎于道。又有盐泉运送武器入山,装载货物的船只沿黄河至水里铺。晚上则有数百戴红头巾的黄崖人抢掠附近村庄的骡马,混战中打死数名乡民和两名驿丁<sup>[63]</sup>。

### 高潮:黄崖之战

当政府骑兵逼近距黄崖六英里朱氏兄弟团练总部所在的集镇水里铺时,一批人正在疯狂抢掠。数名匪徒被捕,其余的人撤至黄崖山安全地带。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山上之人会在自己的地盘上劫掠呢?可能是因为情况危急,黄崖山寨的主要防御体系放弃了朱氏兄弟的部队——他们或许宁愿和贼匪交战,也不愿与帝国作对。当然,没有记载证

明朱氏兄弟的八百精锐参加了随后的战斗。据我们所知，朱氏兄弟也是唯一在大灾难中幸存的黄崖山重要居民<sup>[64]</sup>。

无论水里铺团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知道当地其他地方军队都积极支持政府一方。一位名叫王宗淦的肥城居民以剿灭黄崖为明确目的，捐资训练乡勇。王曾经拒绝参加黄崖山寨的邀请，据记载，他家在政府进兵前的混乱时期被黄崖山民焚毁。然而，阎抚得知当地很多人忠于张积中，决定消灭周围所有的村庄。王宗淦前往巡抚处解释，声称自己没有屈服于张积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占领黄崖山寨的作战计划。巡抚似乎仍有疑虑，王又自拘亲属五十余人为质，其弟廩生宗范也加入队伍，率乡勇为前导，进军黄崖。肥城和泰安的地方军队也加入战斗。至此形成一支超过一万二千人的联合部队，其中三分之一是地方乡勇和团练<sup>[65]</sup>。

在最初几天的战斗中，官军发现山岭崎岖，难以攀越。他们只能痛苦地在危险的小路上缓慢进军。尽管官军火炮夺去了积中弟子刘曜东及其十余名同伴的性命，但山寨防守者控制了战斗开场时的主动权。官方奏报则说如何成功拆毁诸多低矮的路障，并夺获叛军火炮、旗帜、竹竿和鸟枪若干<sup>[66]</sup>。

经过数日激战，官军提出暂时停战，以便让人们知道政策宽大、投降免死之情形。吴载勋又一次被召来与其表兄联络，这次他给张积中写信，要其投降。两天后，吴的信使带来了张的回复。积中信函内容如下：

来函责我不肯出山辩白，甚合我心，但近日苦衷，有意欲为吾弟告者，兄平日淡于荣利，肆志读书，以世乱未平，隐居求志，无如韬光未久，而处士虚声，动人听闻，相从执质者不绝于门，其间虽多良善，亦有悍鸷，兄既未能慎之于始，遂欲以德化之，使胥归于正，此兄实有交不择人之过也。然来东十载，何敢一事妄为，乃去岁以潍县之王小花，横加牵累，今年之冀宗华，妄被诬攀，然此事之来，若椒园（邓馨号）、伯平（陈思寿号）以一函相告，兄

必挺身投案，绝无留难，乃两君卒以兵来，幸适出游，未遭毒手，不然，已陷于纆絏久矣。伯平、雨亭（唐文箴号）复夤夜进兵，示人莫测，以致庄众格斗，伤损弁兵。

兄自知大祸临门，一身不免，亟欲束身司败，不望雪我沉冤。奈及门桀骜之士，遂邀不逞之徒，劫我主盟，苟全性命，兄禁之不得，逆之不能，数日以来，踣躅山隅，闷损无似。及大兵临境，兄欲出而剖白，无如伊等淘淘，不肯束手待毙，祸已至此，无可言说，本欲引剑自决，无如及门在外者甚多，闻予冤死，定不甘心，一旦逞彼凶顽，则各处生灵，俱遭涂炭。兄亟思乘机解散，但人数众多，虎豹豺狼之性者不少，须宽我日期，请暂将大兵撤出山外，俾得反复陈词，婉言解散。若一面进攻，一面招纳，则上宪不能示人以信，困兽犹斗，兄又何辞能劝谕诸同人耶？特约略陈其大概。<sup>[67]</sup>

收到回信后，阎抚再次提出他的安抚条件，宣称山寨中人主动投降者免罪，限期两日投降，但仍然无一人肯冒险下山。相反，山民在寨墙上施放火炮，屡屡伤及官军。

阎抚恐双方玉石俱焚，再次提出临时停战。是日，积中之子绍陵出谒巡抚。阎抚要求限期一日，造作黄崖居民、官员名册。此外，巡抚又令吴载勋致信张积中，承诺如果张服从政府命令出降，可以饶命。在山寨外面，阎抚下令立大白旗一杆，上书“胁从罔治，投降免死”。是夜，张复信与吴，称：“人心洶洶，不能举步，需从缓造册。”<sup>[68]</sup>

民间传言，张的信函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已派密派使者出山，寻求盐泉和捻军的帮助。的确，曹县知县的报告证实，有被捕的捻军间谍供认，他们正准备北援黄崖<sup>[69]</sup>。

由于担心叛军从几个方向联合进攻，阎抚下令官军向黄崖发起全面进攻<sup>[70]</sup>。最终这场惨烈之战使数千人被屠戮，不计其数的人跌落山崖身亡。在万余居民中，无一人投降，其中还有官员家庭二百

余户<sup>[71]</sup>。

张积中知道末日来临,召集亲属、弟子约二百人来到山顶圣人堂。可能已经习惯了有规律的祭祀礼节,人们按资历坐好,积中坐于上首。地上铺满火药,当有人报告说寨门已破时,火药立即被点燃,爆炸声闻数里<sup>[72]</sup>。

有些黄崖信徒虽然被进攻的官军抓获,他们都坚称其唯一愿望就是追随老师而死。官方再大的压力也不可能让他们写下供词。阎抚这样向同治帝描述这些真正的信徒:“他们的眼神凝视,仿佛在念一些奇怪的咒语。”整个山寨遭到毁灭,仅有大约四百名妇孺幼童幸存。巡抚说,即使是妇女,也“形色洒然”<sup>[73]</sup>。

我们可以想象,那天官兵的脸上有着极其不同的表情。官兵中的屠夫们同时进行着野蛮的抢掠。当晚阎抚三令五申禁止抢劫,却未见效果。士兵们面对被害黄崖居民留下的财富欣喜若狂,根本不会打消抢掠的念头<sup>[74]</sup>。

混乱结束后,阎抚亲自登山视察。他穿过铁门和石墙进入山寨,前往张积中与其最亲近的二百个弟子自焚的祭祀大堂。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声称,大厅中尽是楼梯、讲台,宏大奢华,其上覆以黄布。桌椅也违禁使用皇家颜色。废墟中搜得黄丝帷幔及台布百余张。还有其他违禁物品已毁于火中,无法收回。在灰烬中发现张积中烧焦的头颅,悬杆示众。大厅之外,枪剑竹竿都被堆积起来。还发现铅块硝磺并武器清单。清单及张积中书籍副本均被送往军机处查验<sup>[75]</sup>。

虽然很难查明与张积中一同自焚的官员名单,但是阎抚下令要尽力在废墟中搜寻尸首<sup>[76]</sup>。第二天,当地百姓被叫去认尸,所有尸体分男左女右,埋在圣人堂前的池塘里<sup>[77]</sup>。

巡抚指示地方官照料幸存的四百妇孺,并抚恤遭受战乱的乡民<sup>[78]</sup>。随后下令调查黄崖经营的商铺。结果发现,在官军出动前,这些商铺都已关门,店员逃离。在有些房间里还发现了“逆书”及“悖谬乖妄,离奇荒诞”的小册子。鉴于商铺是整个叛乱

网络的一部分,阎抚下令查封。他还下令秘密调查山东各地原有匪巢(如白莲池),查明可能与黄崖事件有关的关系网络。然而,调查结果显示,黄崖事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sup>[79]</sup>。

曾经协助政府进攻的数十名官员,期待着在如此重大的军功中大获奖励<sup>[80]</sup>。唯一没有获得奖励的主要参与者是长清知县陈恩寿和肥城知县邓馨。因为黄崖位于两县交界,两地知县要对此事负责。邓馨因对其辖下的叛乱阴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被撤职查办<sup>[81]</sup>。另一个最有名的没有在事件中获利的人是张积中倒霉的表弟吴载勋。阎抚建议,将吴即行革职,永不录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皇帝并不仁慈,下旨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sup>[82]</sup>。

阎抚自己则似乎由于这次灾难而威信扫地。他在向皇帝的奏报中表达出这样的愤怒和困惑:

(张积中)其家本无厚资,来东不过十载,遂能跨郡连乡,遍列市肆,挟术诓骗,为收集亡命之资。从其教者,倾产荡家,挟资往赴,入山依处,不下百数十家。生为倾资,死为尽命,实未解所操何术?所习何教?而能惑人如是之深。<sup>[83]</sup>

然而阎抚承认,他的初步调查表明,张积中是一个“读书良善之人”<sup>[84]</sup>。他向皇帝请罪,说自己“自惭聋聩”。此后不久,阎抚告病辞职。

### 尝试收尾

圣人堂大火毁灭了张积中的黄崖世界。然而,大火并没有摧毁促使这一村落世界建立起来的教义。事件后,张积中的老师周星垣最喜爱的弟子李光圻继续传播教义,尽管在形式上更加隐秘<sup>[85]</sup>。

清廷对黄崖的指控并没有能够阻止一些知名人士继续表明对泰州学派的兴趣。一个例子就是学者、官员和著名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鹗在扬州跟随李光圻学习,导致他宗教信念的转换,并培养起他那闻名于世的社会责任感。老残角色的原型即刘鹗本人,这一角色表现出泰州信徒之独立性与社会关怀的结合。老残在哲学和医术上的双重兴

趣展示了其教义的又一特点<sup>[86]</sup>。

李光圻去世后，刘鹗劝说泰州学派同门黄归群（葆年）辞去在山东某县知县之职，在上海西边的苏州创办学堂。1902年，扬州人黄葆年在苏州开设学堂（归群草堂）。由于几个富户同门的资助<sup>[87]</sup>，学堂可以为住校的一百多名学生提供补助。课程不是传统的模式，讲授以口头为主，很少使用书本。学堂鼓励学生讨论通俗小说、当地的流言，甚至讲述和分析他们晚上的梦境<sup>[88]</sup>。

总而言之，很快，黄归群就有了数以千计的追随者，遍布全国，其中包括很多地方精英。黄归群在1924年去世之前，指定他的高徒、李光圻的孙子李泰阶继续领导泰州学派的事业。然而，泰阶不久亦死，留下了一个无人管理的学堂<sup>[89]</sup>。

在黄崖周边地区，许多人继续坚持泰州信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义中的大部分哲学内容逐渐消失，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种道教宗派。根据1957年对黄崖地区居民的调查，那时，信奉者每年仍要登山举行宗教仪式<sup>[90]</sup>。

这种传统的不断普及表明，有不少人回忆起政府对黄崖事件的处理时都表示不满。1906年，一位四川御史——据说是泰州信徒——上奏光绪皇帝重审此案。在与山东士绅和官员的谈话中，这位御史得知这些地方精英一致认为阎抚处事不当。他们说，黄崖设防是由于惧怕山东当时混乱的环境，巡抚对那些没有根据的传闻反应过激，贸然动用武力解决这个最初仅是自卫性质的团体。御史请求由现任山东巡抚杨士骧（谥文敬）查明真相，为原本无罪的张积中平反。杨抚奉命调查此事，查明尽管黄崖可能有人心存反意，但积中本人却是一位忠诚文人。不过，杨士骧担心对其前任阎敬铭造成不良影响，将调查结果隐瞒，后来此事声息渐平<sup>[91]</sup>。

如果问题太有争议致使清廷无法解决，一个世纪后的我们能给出一些定论吗？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关键性的事实正在捉弄人似的消失，许多记载都有明显的矛盾。然而，我们尝试着把种种谜团拼凑

在一起，也很难创作出一幅叛贼张积中的画像。积中之兄死于太平军之手，他的表弟以镇压捻军闻名，他本人对太平军和捻军的态度是征伐和逃避<sup>[92]</sup>。他使他的黄崖山寨有了五年的安宁，在如此困难的时期，数百官员受其教义和山寨提供的避难所的吸引，纷纷前往黄崖。这是一场典型的自卫运动，由富户名流鼓动和组织，潜在的动机是保护生命财产。面对一个分裂无能的政府，他们奉献自己的力量，想要在一个无法提供物质和精神安全的大社会里建立起一个新的可替代体系。造访黄崖的人们——从好奇的士绅到官方代表——都对山区避难所背后纯粹的防御动机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然，政府对黄崖的指控似乎相当牵强。形迹可疑之人声称与张积中相通的事实很难作为领导者本身具有反叛意图的确凿证据。再者，就张积中本人来说，最能表明其造反的罪证——那些据称散落于圣人堂的黄布——也是值得怀疑的。根据几种资料，大屠杀后，阎抚因为缺乏能够证实黄崖居民谋反的有力证据而心烦意乱。他命令部下寻找屠杀合理的证据，限期三日，否则将被处死。据说，将军们请来七个裁缝制造罪证<sup>[93]</sup>。为了隐瞒事实，这七人事后全被杀死<sup>[94]</sup>。事实上也不可能在大爆炸中找到完整无缺的丝绸。

尽管证据不充分，为什么阎抚仍然认为有必要下令进军呢？政府举措失当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黄崖事件为清朝的没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情报不足、信息不实以及决定草率。作为一个独立王国，黄崖在国家安全体系控制之外能够持续如此之久，本身就是官僚制度腐朽的强有力证据。巡抚对这个拥有八千户居民，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员在内的团体知之甚少，无所作为，更是难辞其咎。

然而不能单纯指责官僚体系的窳劣。因为在故事的表象之下关于阎抚的行为似乎有一个更阴险的解释框架。1866年秋，山东的官员们很难有上佳政绩向北京朝廷报告。抗税和叛乱在山东四处蔓延，官员仕途极为不顺。阎抚本人在1866年春因山东的

动乱局势而降职,随时有可能丧失前程<sup>[95]</sup>。我们认为黄崖之战可能是他重获声望的一种有利可图而且风险相对较低的手段,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指责吧<sup>[96]</sup>?实际上,事情的结局——尽管阎提出辞职——是他此前地位的恢复。后来,这位巡抚逐渐升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和署理兵部尚书、授东阁大学士的显赫地位<sup>[97]</sup>。巡抚亲自督战,对这场所谓的邪教叛乱加以镇压,无疑对延续阎敬铭未来的政治生命有一定的帮助。

围绕黄崖,有足够充分的不当行为使其因邪教指控而引人注目。首先,该团体信奉诸教合一的哲学、重视治病术可以狭义地解释为对正统教义的挑战。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王艮和林兆恩,实际贬低死板的程朱理学,暗示着罔顾清朝正统,甚至也许暗示着对恢复明王朝的同情。

更潜在的罪证是这场运动的社会构成。如果张积中的两名女性弟子的地位具有普遍性,那么女性就被赋予了尊重和平等之义。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该团体暴露在“男女混杂”的罪名指控之下。盐泉之加入山寨,引发了更多的麻烦。看起来像是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的黄崖,是各种阶层和各种利益的联合。与中国的许多自卫性组织——看更、护院、青苗会、乡团之类——一样,黄崖的人力资源主要来自乡村社会下层。尽管领导者可能是有产者,抱持一种防御性理念,普通的新加入者却往往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姿态和状况。

在黄崖事件中,地方精英和社会底层之间的联盟得到了泰州传统的认可。这让我们想起,创始人王艮本人就是打开山东营销关系的盐商。王艮一直努力为贫困盐农争取利益,并且同时欢迎下层民众与读书之人进入他那不同寻常的学校。我们不知道泰州哲学和山东盐市之间的联系是否已经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之久,不知道同样的联系是否为张积中逃亡北方避难并与山东盐泉联络准备了条件。我们知道的是,泰州信仰以公开招募为基础。因此张积中必然会出于道义欢迎那些在山东社会底层闯荡的追随者。

尽管张积中并不以发展他的村落作为叛乱的掩护或借口,但恰恰相反的是,其手下之人似乎确实愿意采取这样一种举动<sup>[98]</sup>。迫于政府压力,一些逃离黄崖的盐泉显然想在捻军那里碰碰运气,后者原本也是私贩出身者居多。

思想和现实需要的结合吸引了士绅和盐泉,同样也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尽管不可能重构盐泉和士绅之间关系——将两者捆绑在一起、拼死反抗强大的敌人的关系——的确切特征,但是,面对官军入侵,亡命之徒和乡村精英的融合确实形成了一种爆发性的合作关系。

可以肯定,阎抚有他仓促行事的理由。捻军迫近,异端教派的叛乱在全省到处蔓延<sup>[99]</sup>。黄崖离省城不足三十英里,所有报道都称黄崖的领导者有能力、有才智。但是,以后见之明的优势来看,十分明确的是,阎抚草率而无知的决定导致了并不必要的、万余人死亡的大屠杀。这是政府高压手段的一个典型事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政府高压急剧增加了中国乡村精英阶层对政府权威的疏远,并使地方保护主义和土匪势力结合,形成武装反抗。

半个世纪后,不成熟的民国政府和晚清统治者相比,也无法更好地对乡村地区施加控制,种种掺杂宗教启示的自卫团体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华北。1920年代的红枪会——曾声称拥有成员三百万——虽然最初是因地方名流为抵抗盗匪而发起的,同样也吸引了众多为生存而斗争的亡命之徒加入其中。就像黄崖的先辈们那样,随着他们对低效无能的中国政府及其文化基础幻想的破灭,红枪会采取了一种结合儒学和宗教的特殊方式。同样,也像聚集于黄崖的士绅们一样,红枪会最初并未反叛,只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干涉,他们才奋起抵抗。

在1860年代,大批乡村精英沉溺于某种奇特的宗教教义、与不法之徒结合、抵抗政府镇压的情形十分罕见——这就是黄崖之谜。大约五十年后,尽管确实发生了许多变化,这样的事情却是屡见不鲜

的——这就是黄崖的意义。

#### 注释：

- [1] 对于鲍德威 (David Buck)、焦大卫 (David Jordan)、柯白 (Robert Kapp)、韩书瑞 (Susan Naquin), 特别是刘广京 (K. C. Liu) 和周锡瑞 (Joseph Esherick) 提供的帮助, 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还要感谢国立台湾大学的陈华在资料方面提供的无私帮助。本文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 这一珍贵文献收录了二十多种关于黄崖事件的资料。
- [2]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第129、133、173—174页。
- [3]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第174页。
- [4]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第134、164页。这些记载并不矛盾, 因为那时捐纳功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 [5]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第129、164、170页。重要的是周天爵是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忠实信奉者。据我们所知, 与张积中相关的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王阳明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
- [6] 南京被太平军攻陷后,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 积中与他的两个同僚前陕西巡抚钱江, 进士、刑部侍郎雷以诚 (字鹤皋) 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 [7]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第137页。
- [8]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第174页。
- [9] 最著名的是《山东军兴纪略》, 见《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第173—180页。这部编年史是黄崖事件发生时山东巡抚阎敬铭的幕僚编写的。这一记载很明显夸大了积中思想的“异端性”, 以此消除人们对阎敬铭在事件中反应过激的质疑。
- [10] 宇宙论导致一些学者把泰州学派和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联系起来。参见侯外庐:《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 [11] 狄百瑞:《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 第157—160页; 富路特、房兆楹主编:《明代名人录》,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 第13821页; 陈道坦等纂:《泰州志》卷21, 1908年, 第5—6页。
- [12] 狄百瑞:《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 第162—171页; 富路特、房兆楹主编:《明代名人录》, 第13821页;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2, 台湾中华书局1966年, 第6—7页。
- [13] 富路特、房兆楹主编:《明代名人录》, 第912—914页。
- [14] 柳存仁:《三教合一说大师林兆恩》,《通报》卷53, 1967年, 第263—270页; 富路特、房兆楹主编:《明代名人录》, 第913—914页。
- [15] 柳存仁:《三教合一说大师林兆恩》,《通报》卷53, 1967年, 第277页。
- [16] 据那时的碑文石刻记载, 仅河南一省, 就建有五百九十余座三教堂。这种记录需要所有科研机构对可能秘密存在祭祀中心的地区进行调查 (《清实录》乾隆朝, 卷218, 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 第7—8页)。
- [17] 即使在明代, 泰州传统的追随者们也遭到迫害。王艮两个出身名门的弟子何心隐 (1517—1579) 和李贽 (1527—1602) 都是在他们的社会激进行动引起政府指责后, 死于狱中。关于泰州学派这些重要人物更多的情况, 参见狄百瑞:《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 第178—222页; 侯外庐:《十六世纪中国的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2, 第1—4页。
- [18] 徐珂:《清稗类钞》卷37, 商务印书馆1966年, 第60页。
- [19]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第191页;《清稗类钞》卷37, 第60页; 刘厚滋:《张石琴与太谷学派》,《辅仁学志》卷9第1期, 1940年, 第92—93页。
- [20] 《山东军兴纪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 第174页) 记载, 周死于狱中, 但是该书可能存在一种倾向, 试图形成一个反对黄崖事件的框架, 以便加强对阎敬铭镇压政策的舆论支持。《安徽通志》记载, 周被错误地逮捕, 随即释放。

- [21] 一种记载认为李和张是姨表兄弟。见刘厚滋:《张石琴与太谷学派》,《辅仁学志》卷9第1期,1940年,第83页。
- [22]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91页。
- [23]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64—165、192页。
- [24] 除了张和李的学堂以“和平派”闻名,周星垣的第三位重要弟子蒋子明,主要以皖北为中心,其学堂以“激烈派”著称(《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65页)。
- [25]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4页;《清稗类钞》卷37,第61页。
- [26]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64、174—175页。
- [27] 在张到来时,吴已历任许多地方的知县,并且因辛勤征税得到皇帝的认可(《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46页)。
- [28]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0、175页。
- [29]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0页。
- [30] 1855年黄河向北改道,使发源于安徽的捻军首先有了进入山东的可能。1860年,安徽北部的涡河和淝河泛滥迫使捻军离开家园,到山东掠取粮食和马匹。这时期捻军骑兵的猛增是山东盗贼横行的结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期。参见蒋相泽:《捻军起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63—64页。
- [31]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0、175页。
- [32]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96页。
- [33]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46、175页。重要的是,吴因为成功地动员当地军队抗击捻军而受到委任。
- [34]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85页。
- [35]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5页。
- [36] 这场起义指的是刘德培起义,这位淄川县的团练首领组织农民抗税,与公开反清的捻军结成联盟。作为济南的父母官,吴奉命调集军队加以镇压,刘德培曾是吴的学生之一。吴最终因镇压不力而被免职(《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45、146、162页)。
- [37]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4页。
- [38]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68、185、187页。
- [39]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5、195页。一份仅存的张向其学生讲学的文献记载:“欲不可纵,纵欲则败度。洙泗之间,断断如也,尔其识之。诸子居山,各共尔事,毋以我居山外而怠其学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矣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非之,予从而教戒之,尔识之,其听予言!”(《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56页)
- [40] 一个记载称,圣人堂除了供奉孔子外,也有伏羲(传说中发明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的圣君)、文王(为其儿子武王建立周朝奠定了基础)、周公和张积中的老师周星垣(《清稗类钞》卷37,第63页)。
- [41]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63、175、191页。
- [42] 张积中的讲学有一部分内容如下:“佛氏明心见性之说,即大学致知之说也。……程、朱之学,本于正心诚意,而略于致知。逮乎王阳明,而致良知之说,始畅于天下,而当时儒者,复以攻佛之见而转攻阳明,嘻!昧亦甚矣!佛入中国,始以象教,盖化愚也。……孔、孟而后,千有余年,致知之旨,赖佛法以显,而后儒之执心为言者,乃议者髡而缙也,不亦惑乎?……善学者,得其意而已。”(《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54页)
- [43]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83、186、195页。
- [44]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1页。
- [45]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411页;“月折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谢兴尧:《道咸时代北方的黄崖教》,《逸经》第3期,1936年,第7页。
- [46]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4、175页。
- [47]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1、195页。
- [48]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4—135页。
- [49] 理想化的儒家社区思想曾被哲学家何心隐介绍给泰州传统,他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社团,被称为“聚和堂”。参见狄百瑞:《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第180页;周志文:《泰州学派对晚明文学风气的影响》,国立台湾大学硕士毕业论文,1977年,第33页。
- [50]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4—135页。

- [51] 汪宝树称,造成黄崖惨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可以由下仰视的建筑群给人造成深刻的幻象。他这句话的准确意思不够清楚。或许正是这富裕的气氛,才会煽动谣言,诱使政府出兵。也许,建筑看起来足够霸气,表明了叛乱的野心。我们知道汪把黄崖群落比作著名的武夷山幔亭,秦始皇在公元前245年在此举行过盛大的宴会,黄崖的宏伟壮丽足可与其媲美。见李厚基等修,沈瑜庆、陈衍等纂:《福建通志》卷2,1938年,第625页。
- [52]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29、176页。
- [53] 事实上,根据一份资料,他们是张琪的学生,张琪显然是张七的同音异形字。张积中在其追随者中以“张七先生”著称,因其在家中排行第七(《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6页)。
- [54]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29—130、176页。
- [55]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49页。
- [56]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83、187页。
- [57] 关于记载这一使团详情的资料是矛盾的。一种资料记载,吴氏没有称张不在,相反他通知代表们说山寨聚满了人(《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0页)。另一版本说长清知县自己走访了黄崖山,当知道张积中不在时,他留下一封信告诉张积中回来后去省府拜见。但是张积中写信拒绝了(《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48页)。然而,第三种资料称,当长清知县去黄崖山时见到了益都知县的父亲,其父是积中的一个朋友,并且到山寨去劝积中出山。其父肯定来访的知县不会对黄崖有什么危害。然而,当两人谈话时,这位父亲收到一封来自山寨的信。信中称,长清知县要来山寨调查,请立即杀掉他。这位父亲非常震惊,把信给知县看,并且为自己错误估计黄崖山的形势而道歉(《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86页)。
- [58]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6、180—181页。根据其他版本,被杀的人是长清知县的侍从(《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0、148、186页)。
- [59]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49页。
- [60]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7、149页。
- [61]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6、181、184页。
- [62]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6—177、181页。
- [63]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2、177页。
- [64]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5页。
- [65]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0—131页。
- [66]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1页。搜获四十余套标有“太平天国”字样的军装——这则记录是阎敬铭提到的——令人难以置信。在次月给清政府的另一份奏报中没有提及此事,这一事件的官方记录《山东军兴纪略》也没有提到。
- [67]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8页。
- [68]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8—179页。
- [69]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3、179页;“月折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 [70] 据一则史料记载,阎敬铭听到黄崖与捻军联合的消息异常愤怒,下令毁灭山寨,但他被长清知县陈恩寿劝阻,采用了一个较为宽容的政策。不久前,陈恩寿自己去过黄崖山,他非常清楚黄崖山正处于实质性的戒备状态。他问巡抚,那些人既然要密谋叛乱,为什么还要携带家人和财产呢?大半是被胁迫的。在陈的坚持下,阎敬铭下令只杀成年男性。(《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49页。)
- [71]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43、179页;“月折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阎敬铭的记载称,他们决不投降。然而,根据一些记载,虽然万余人被杀,但仍有一千余人在长清知县的个人劝说下,由西门投降。(《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82、186页。)
- [72]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95页;“月折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 [73] “月折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 [74]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84、188、195页。
- [75]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9页;“月折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后来军机处认为此书晦涩难懂。
- [76] 根据一则报道,陈恩寿实际上找到了黄崖山居民的名单,但是决定烧掉它以拯救他们的亲属(《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50页)。

- [77]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95页。
- [78] 然而根据一则史料,很多儿童被官府掳获卖掉(《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6页)。
- [79] “月折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 [80] “月折档”,同治五年十月十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上谕档”,同治五年十月十日、十一月三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 [81] “上谕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 [82]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3—134页。到达黑龙江后,吴开始处理各种边境事情:讲和、重新勘定边界、中俄边界谈判、确定蒙古边界。当有显著政绩后得到皇帝的原諒获准返乡(《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45—146页)。
- [83]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79页。
- [84]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80页。
- [85]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67—168、194页。
- [86] 《辅仁学志》卷9第1期,1940年,第82页;《老残游记》:前言。老残游记第九回纪念李光圻,第十回、第十一回纪念泰州学派追随者黄归群。在第八章中刘鹗阐明了他的哲学观点:儒释道三教就像三家店铺挂出的招牌一样,实际上他们都是混合着卖,他们卖燃料、大米、石油、盐。但是属于儒家的商店是最大的,佛教跟道教次之。各个商店物种齐全(刘鹗:《老残游记》(哈罗德·沙迪克英译),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2年,第97—98页)。
- [87] 除刘鹗外,支持者还有淮军将领程文炳的儿子程恩培,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毛时俊,山东巡抚杨文清的大哥杨世生(刘厚滋:《张石琴与太谷学派》,《辅仁学志》卷9第1期,1940年,第90页)。
- [88] 刘厚滋:《张石琴与太谷学派》,《辅仁学志》卷9第1期,1940年,第89—90、109页;卢冀野:《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东方杂志》卷24第14号,1927年,第73页。
- [89] 刘厚滋:《张石琴与太谷学派》,《辅仁学志》卷9第1期,1940年,第90页。
- [90]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66—168、194页。
- [91] 刘厚滋:《黄崖教案质疑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第329—334页;刘厚滋:《同治五年黄崖教匪案质疑》,《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2期,1936年,第205—206页。当时也有一些熟悉此事的官员认为政府的攻击根本不合理(《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36—137、166页)。
- [92] 张积中自己写的一些文章提供了他反对捻军的进一步证据。一个是“徐州屯田说”(在徐州军营的演讲)非常明确地提出政府平叛的政策建议。在张积中的散文中他认为政府应该治理被水淹没的农田,加固河床,建立军营以防捻军北进(《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60—161页)。第二条证据是张写的一封信,他警觉的记下,“张与龚(译者按,捻军的两大首领张乐行和龚得树)的毒雾已传到山东南部。张描述捻军骑兵经过的村庄时说“尸骨遍野”(《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57页)。
- [93] 这也解释了阎巡抚记载的太平军军装的事情。
- [94]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82、184、185页。
- [95] 《清实录》同治朝,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第3990页。
- [96] 巡抚的方法看起来好像得到了几乎全部下属官员的支持。有趣的是,在少数对进攻政策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中,主要是南方人,例如,强烈要求赦免黄崖居民的官员陈恩寿来自浙江。看起来,对泰州信徒持同情态度的主要是南方人。相反,可能是北方官员对富裕的南方避难者存有仇恨和嫉妒,加剧了这场灾难。遗憾的是没有足够的相关官员的背景信息证明这一点。
- [97] 《清实录》同治朝,第4344页;《清史列传》卷57,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0页。
- [98] 黄崖惨案一年以后,在山东南部逮捕了三十余个土匪和十三个盐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假说。经审讯,其头目承认他们从黄崖山逃走,后来参加了当地走私团伙。当捻军进入这一地区,他们借口保护当地富裕家庭的财产招募新兵,谋划起义。聚集三百余人后,他们给捻军蓝旗首领陈怀中信信,约定起义日期。他们希望通过与捻军的暂时联合来增加声望,这样他们就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武装团体(《山东近代史资料》第1册,第193页)。
- [99] “月折档”,同治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十月五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